

西方经济人类学理论发展的历程

许 婧

[摘要] 经济人类学自 20 世纪 40 年代成为现代学科以来, 经历了一个学科发展的黄金时代, 面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趋势, 一直在稳步发展。尽管时代不同, 但交换、货币、消费和私有化一直是经济人类学讨论的主题。

[关键词] 经济人类学; 理论; 市场; 交换; 文化; 货币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0)01-0056-05

作者简介: 许婧, 厦门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福建 厦门 361005

经济人类学是 20 世纪经济学与人类学两个学科结合在一起的产物, 是一门从人类学角度出发, 运用民族志等方式研究人类经济制度和行为的科学。^[1] 它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 既可以描述人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方式, 以及这些系统如何组织、运作并与其他系统发生联系; 还可以建立理论来描述分配决定的过程、经济的制度脉络和影响; 经济制度的运作和动力, 经济如何影响人们以及人们的行动如何影响它们的经济制度^[2]。现在, 文化也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经济^[3], 经济人类学家通过实地考察, 运用民族志方法, 用自己的学科理论来解释经济观念。

一、家庭、经济与人类: 经济人类学的兴起 (1870—1940)

“经济”这个词从古希腊语而来,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对“家庭事物的管理”, 是一个大家庭管理事务的规则。经济的原义是强调将奴隶、牲畜等固定在房子里。因此, 家庭经济一直是人类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皮尔逊 (Pearson) 对家庭经济的主要观点集中在《原始经济》。对早期旅行者来说, 土著“孩子般”的交换, 有价值的财产被刻意损毁或者是经过艰苦努力却没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这些行为看上去与欧洲理性思想是矛盾的。皮尔逊指出, 人是有不同心理活动的主体, “原始人”的经济行为, 允许忽略环境和技术, 与现代西方个人更为接近。

(一) 马凌诺夫斯基与经济人类学的产生

马凌诺夫斯基是经济人类学的开创者, 他对经济人类学的主要贡献在于《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专门讨论交换, 《珊瑚花园与他们的魔法》讨论工作、技术和财产分配。他坚持特罗布里恩岛民的习性是将物当作礼物并将之视为“部落经济”, 拒绝承认“经济人”的概念是全人类共有的。岛民对他们的花园关注则与野蛮人只是为了满足生存不愿辛苦劳动的想象是相矛盾的。航海的目的是为了展现岛屿之间复杂的贸易交换, 这个市场并不是由市场利益、货币或国家组织起来, 也不是因为贪婪而进行交换, 而是库拉价值的转换, 贵重的交换称为“jinwalj”, 番薯意指母系亲属间的交换, 称为“urjubar”——完全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概念相一致^[4]。

莫斯的《论献祭》与马凌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是对立的。莫斯对马凌诺夫斯基的美国西北海岸的夸父宴在美拉尼西亚非常盛行的观点表示赞同, 但是他坚持认为货币和市场是人类普遍现象。莫斯批评了功能主义强调个人的观点, 认为社会和精神层面的交换在所有社会, 包括现代社会都存在。他的人类学被限制在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方案中, 引起了很多学者的争论^[5]。

弗斯 (Firth) 关注原始经济, 强调原始经济是一种“社会事务”, 并认为他解决的“虚假伪——问题”, 就是由马凌诺夫斯基坚持认为的“复杂的社会义务”, 弗斯认为这种复杂的社会义务并不会偏离“理性经济选择”的基本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讲, 他应该被视为第一个“形式主义经济人类学家”。他用经济的基本分类来组织自己的文章, 但是为了理解行为模式的理性特点, 他也详细描述了背景。结果出现了丰富的带着理性选择印迹来描述经济体制的民族志材料。

(二)赫兹克维兹与现代经济人类学的出现

赫兹克维兹(Herskovits)的《原始人的经济生活》是一个科学民族志。书中系统地将经济学理念和民族志成果并列考虑,这标志着现代经济人类学出现了。

在经济学领域内,赫兹克维兹希望在世界范围内找到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例子,就在那个时期,新古典经济学正面临体制经济学家的严重挑战。大萧条破坏了自由的信誉,为了重新恢复公众信任,银行系统只能制定更为严格的规范。美国人类学家并不将自由主义经济奉为神圣。赫兹克维兹也将自己的材料组织起来用经济学家更熟悉的标题命名,甚至认为“因为在非工业化经济中,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作为资本始终存在,它们一定会产生些回报”^[9]。但是他也认为用民族志材料来批评正统经济学,就像民族志证据中的“无文字民族”被剔除一样荒唐。赫兹克维兹实际上在对比“机器和非机器社会”,他还试图表明古典经济学可以扩大应该用到后者,并且批评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自己文化上的局限性。他一直坚持认为“比较经济学”是两个学科互相促进的计划,反对任何科学仅仅只依靠推论和感性认识或者忽视事实。

二、政治与发展:经济人类学发展的“黄金年代”(1950—1970)

和平与发展成为 19 世纪的标签,世界经济长期繁荣,经济人类学在这个时期得到长足发展。

(一)“形式”与“实质”之争

“实质主义”学派创始人波兰尼对现代资本主义展开批判。在《大转型》和《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中,他提到“经济是制度过程”。他认为“经济”这个词有两个互相作用的意思:实质的和形式的^[7]。第一个指物质欲望的供应,第二个是一种手段,它使经济过程中的精神关系终结。大多数后工业社会都由制度作为规则,它可以保证集体存在,但是工业社会有一个“脱嵌”的经济,“市场”作为社会规则是个人决策。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基于经验研究可以对第一种进行研究,经济学抽象的研究方法更适合研究第二种。换句话说,经济学家在现代社会能够保留他们的主流学科地位,人类学家只能研究剩下来的异文化或死去的社会。波兰尼的追随者后来成为“实质主义”经济人类学家,那些坚持认为经济学概念和方法在人类学领域也能运用的就被称为“形式主义”经

济人类学家。1968年由列克莱尔(Leclich)和斯内尔德(Schneider)主编的《经济人类学》收集了两方观点的文章。实质上这只是方法论之争,一方认为经济在每个社会都存在,另一方则不这么认为,而认为只是认识上的差异而已。

形式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博汉南夫妇(Bohannan)研究了尼日利亚的提夫人经济,其中关于交换、市场和货币的文章至今还影响人类学研究。博汉南夫妇坚持认为提夫人的文化分类观点对理解提夫人经济有重要作用,同时将波兰尼提出的人类社会中的三种交换体系作为一种跨文化的比较方法介绍给大家。在达荷美的研究中,波兰尼坚持“普遍目的使用的货币”和“特殊目的使用的货币”之间存在差异,他认为非工业化世界中“特殊目的使用的货币”流通范围更广。博汉南发展了这种观点,证明提夫人有独立“交换的另一面”。西方货币随着殖民主义进入是个文化上的灾难,它们打破了提夫人交换的两方面。提夫人的故事已经成为人类学中的神话,每个学习人类学的学生都要知道它,尽管有人说他们的研究事实错误,理论幼稚,误导他人。

博汉南与乔治·多尔顿(George Dalton)合编了著名的《非洲的市场》这本书主要用个案研究来说明非工业社会中的经济行为,他们更关注“市场地”而不是“市场”^[8]。多尔顿的逻辑思路是波兰尼最初的建议即人类学家应该研究有限的非资本主义经济,他还使“形式”和“实质”的学术之争持续火热^{[8] (P. 62)}。

Richard Salisbury的《从石器到铁器》叙述了美拉尼西亚的经济转型,在形式主义的前提下提供了丰富细致的民族志。Poly Hill的《加纳南部的移民可可种植者》^[9]告诉我们加纳是世界最大的可可生产国,但其农民被假定为非洲“农民”,依靠自己的农场种植可可维持生计。他追溯可可种植起源于 19 世纪后半期,种植者是开发原始森林的先锋,往往是有能力的公司雇用瑞士建筑公司进行他们需要的基础设施。他们发明新的耕种技术作为招募劳工的手段。Hill认为,加纳的可可业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初阶段,但这些种植者没有抓住机遇和本质,被西方霸权打破了通往资本主义的道路,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充分发展出资本主义。

(二)“发展”与经济人类学

格尔兹与“发展”范式密切相关,为 20 年后经

济人类学的“文化转向”奠定了基础。他出版了 3 部相关著作,《农业内卷化》是按传统框架研究爪哇经济为什么不发达,但是他从艺术史中借用了一些概念进行分析;《小贩和王子》在爪哇人市镇中区分了两种理想的经济类型,其中大多数人在街道进行经济行为的类型他命名为“集市型”。与此相反的“公司型”经济,包括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大部分企业,通过计算避免危机。国家政权机构为这些企业减少竞争提供保证,从而顺利地完成资本积累。而“集市型”是个人主义的和竞争性的,因此要将资本累积到很高是非常困难的。格尔兹的《尼加拉》是将集市作为其研究的模型,研究在竞争性市场中个人的选择,同时将集市模型看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霸权下的产物。当政治改革改变了群众生产和消费以及企业的路线时,现代学科转向个人主义方法论。国家越强大,资本主义企业和社会越有权力,可能成为国家垄断特权^[10]。

随着学科的进步,关注“发展”的人类学家数量不断增长,但是这些研究“不是基于认真调查经济增长和下降根源后得出的结论”^[11]。《发展理论》^[12]中提到由于工业革命,“发展”有两个意义:资本主义增长的资源和改善增长的破坏性后果。用人类学家“发展”的观点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主要的趋势就是研究“发展”,反映贫穷国家的悲惨历史。James Ferguson的《反政治的机器》揭露了莱索托发展项目的弊病,他表明经济行动都隐含在当地意义中,但都以提升城市居民利益结束,当地居民都没有得到预期效果。他的《现代性的期待》是对赞比亚铜带省人民生活的再考察,书中典型的以古德曼和曼彻斯特学派(自由贸易学派)的观点进行研究和历史人类学考察。在这里人类学家第一次参与了全球化框架下不平等现象的争论。

(三) 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与经济人类学

20世纪70年代,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在对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研究中产生出来,萨林斯(Sahlins)的《石器时代经济学》融合了实质论、形式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1978年,古德曼(Gudeman)提供了有关巴拿马村庄商品化研究的《农民经济的终结》书中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价值的基本问题。

阿尔都塞(Althusser)和 Balibar 出版了关于资本的文章^[13],这本书符合结构主义的方法和系统

理论。在他们的研究中,现象学中人的主体性、辩证和历史本身的影响在减少。法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生产结构的理想模式很明显,有三个基本成分——生产者、非生产者和生产方法——被视为是具体生产模式中变量的组合^[14]。生产者做决定的时候,都很注意经济、政治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

古德里耶(Godelier)1966年出版的《经济学的理性与非理性》将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将理性概念用在人的方面和系统上,为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盛行铺平了道路。法国人类学家将法国结构主义和德国哲学结合起来,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英国科学经验主义,对经济人类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受系统理论和辩证法的影响,结构功能主义出现了,Joel Kahn和弗里德曼在研究中应用了该理论。Joel Kahn深受阿尔都塞的影响,关于印尼的民族志^[15]更具有经验性;而弗里德曼^[16]受到古德里耶研究方法的影响,重建了利奇(Leach)关于上缅甸高地民族志的声誉,将整体论融入到经济人类学的视野中。二战以后,当社会民主主义让位给保守的新自由主义时,法国马克思主义也消失在学术界。

三、货币、市场与物:遭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类学(1980—)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已经威胁到凯恩斯在经济学领域内的学科霸主地位^①。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超越现代国家的控制,市场机制有效运行,市场流通更有效率。苏联的解体使世界市场统一不再是梦想;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国家经济的复苏,使世界资本流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另外,交通和通信的变革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网络社会”。经济人类学家的工作显得很尴尬,当他们批评资本主义文化的时候,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经济,更多自我意识方面的理论出现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经济学的历史和政治观点^②。人类学家至今都在避免直接和经济学家发生正面挑战,尤其在经济学家擅长的国家和全球化经济分析领域中;在“后现代”标签下,作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田野调查遭到了挑战。经济人类学现在主要研究资本主义运作的核心及其在全球的传播;社会主义转型期私有化的地位;被各种国际组织定义为“穷人”的发展状况等等。

(一)人类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人类学家开始转向研究长时段内的世界资本主义。Mintz在《甜与权》中描述了糖在英格兰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的历史,以及资本主义形成的摇篮。Eric Wolf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中提出比较的框架,把 20世纪民族志神话纳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史的范畴。他认为文化只是政治经济发展下的产物。萨林斯在《文化和实践理性》中从结构上批评了上述观点,认为文化不是只由政治经济发展过程而来。萨林斯尖锐地反对人类学关注西方资本主义,他相信完全可以通过文化研究发展一种理论代替现有理论来研究非西方社会。

(二)物质、货币、市场与交换

吸收了 Boas的文化多元主义后,人类学家很快意识到资本主义也是多元的^[17],并不仅仅只有国家一种分类。这一时期有关货币的研究大量出现。Thomas Crump的《The Phenomenon of Money》^[18]是先驱,他还分析了哈特的著作,认为哈特将国家和市场比做“硬币的两面”,从世界历史角度分析作为信息革命的结果的货币。接着他分析货币与语言、时间、数字等之间的共性,认为货币有巨大的能量^[19]。Weatherford的《The History of Money》^[20]讲述了各种货币的历史。Parry和 Bloch的《货币与交换道德》则是研究非西方人怎么使用货币,怎样用货币来自我实现。在人类学家眼中,货币通常被看成一种不好的东西,特别是人们没有拥有很多的时候。Kwon告诉我们:随着美元成为通用货币,越南大部分地区流行的通过支付金钱给鬼魂的民间信仰已经走向消亡^[21]。

市场是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Marjanne Lieber的《市场和现代性》是对挪威食品公司的研究。她认为企业营销是一个共享、有专业知识的专业系统,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运行一种“脱嵌化机制”。Appelbaum在《市场时代》^[22]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展现了现代市场在 18世纪的英国起源,20世纪在美国发展到顶端。Taussig Ong一辈的学者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当地文化的破坏性后果,Kwon这一代转向了更适合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文化接触模式。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方面已经转向消费。Mary Douglas和 Byron Isherwood认为,如果经济学家把顾客的选择视为现代经济的动力,他们应该转向人类学家对文化逻

辑的考察。但是,市场的专业化已经建构了一门科学^[23]。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区隔》研究了社会阶级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显现的。阿布杜兰(Arjun Appadurai)在《物的社会生命史》一书的导论部分写到:要打破马克思对商品生产的强调,转而专注商品从生产、交换/分配直至消费的整个轨迹^[24]。接着,米勒(Miller)出版了一系列关于购物、互联网和手机消费主义的书。他的研究发展了“物质文化”这个大名称,关注物的重要性。

Weme研究了交换这个经典主题,告诉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农民是怎么应付“去地方化”的。Lemon分析了莫斯科人在文化上怎样理解货币;Humphrey与经济学家一起对交易进行实证研究,研究俄罗斯精英分子怎么选择住房。从这些研究来看,人类学家已经跟得上不断变化的学科风格^[25]。

(三)文化经济

新自由主义经济到底是什么在学界还是一个未定论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新自由主义经济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力量在于他结合了文化形式。因此,近来对经济人类学影响最大的是文化研究。正如陈庆德教授所言:“经济过程绝非冷冰冰计算的合理性,它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26]。古德曼运用了严谨的文化研究的方法去研究经济,在《作为文化的经济:生活的模型与隐喻》中,他用“当地模式”观点去看拉丁美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本身和农民经济。《与哥伦比亚对话》证明在现代社会里,民族志田野工作记录作为生活情况的历史,可以帮助经济学家在已经死亡的背景中进行研究。当然,古德曼也质疑人类学家过分与经济思想史结合,将贸易视为研究的标准工具。他在《经济人类学》中提出了“社区”和“市场”两个概念,将前者视为“根基”,可以在人类经济的任何方面使用。Homborg批评他远离了当地行动者概念,走向了普遍主义,使得他的研究更像经济学而不是人类学;同时他指出古德曼是一个游移不定的后现代主义者,缺少一种“事实”认识论。古德曼对这些批评在《经济人类学》一书中也做出了自己的解释^[27]。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经济人类学研究成果不断。Clammer出版了《新经济人类学》,奥特兹(Sutti Ortiz)编著了美国经济人类学会的第一期论文集;普莱特纳(Stuart Plattner)出版了一部与形

式主义联系非常紧密的,反映美国经济人类学发展的论文集。Rhoda Halperin被看成形式主义和制度主义者,他试图建立“一种与经济学相对应的科学”;Richard Wilk同样热衷于文化转向;Susana Nairns从马克思主义和南美文学中借鉴理论。当代人类学中,女性主义、地方性知识系统明显影响了我们对经济的看法。James Carrier最近编辑了综合性的《经济人类学手册》前言发出与前辈一样的疑问:人类学家仍然试图找到与经济学家同样的结论。谁知道是否有人倾听人类学家的声音呢?

小结

总之,透过经济的视角,人类学家希望找到最一般的、不同层次的经济组织的规则。经济人类学家不希望自己被看成是研究“原始人的经济”的,他们想找到更好的学说来解释经济现象,同时,人类学家根据他们的长时段田野调查,可以深入了解当地人民的生活,了解当地人的想法和做法,因此积累了客观的关于“异文化”,主要是国内消费的资料库,而且固定用文化相对范式,其定义和内容都与主流经济学相反。用经济人类学,可以解决资本主义是否存在等困扰几代学者的问题。

注释:

①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货币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主要鼓吹者。

②例如 Duménil Louis From Mandeville to Marx—The Genesis and Triumph of Economic Ide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该书认为,马克思是个社会经济学家,其思想基本没有脱离古典经济学设定的区域,将个体看成人与自然关系的首要元素,而政治只是次要的,于是封建让位于资本主义市场,然后最终将让位于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 [1] Economic Anthropology Introduction Edited by Stuart Plattn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2] 转引自庄孔韶主编. 人类学通论(修订版)[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5: 101.
- [3] 黄英贵著. 返景入森林[M]. 台北: 三民书局, 2008: 263—275.
- [4] [英] 马凌诺斯基著.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 梁永佳, 李绍明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377—93.
- [5] 王铭铭主编. 西方人类学名著提要[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4: 124—138.
- [6] Heskovits M. Economic Anthropology the economic life of Primitive Peoples New York: Norton 1952. PP. 303.
- [7] K. Polanyi, Arensberg and Pearson (eds).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 Econom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 Glencoe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1957. PP. 243.

- [8] 转引自施琳著. 经济人类学[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2: 225.
- [9] Polly Hill. The Migrant Cocoa Farmers of Southern Ghana. Hamburg: LIT 1997.
- [10] Hart K. 1973. Informal income opportunities and urban employment in Ghana.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1 (1): 61—89.
- [11] Hart K. 2002. Anthropologists and development. Norsk Antropologisk Tidsskrift 13. 1—2: 14—21.
- [12] Cowan M. and R. Shenton 1996. Doctrines of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 [13] Althusser L and 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 [14] Balibar E. 1970. The basic concept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Althusser and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199—208.
- [15] Kapp J. Economic scale and the cycle of petty commodity production in West Sumatra. In M. Bloch (ed) Marxist Analyses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1975.
- [16] Friedman J. Trobriand state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M. Bloch (ed) Marxist Analyses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1975.
- [17] Blinn M. Capitalisms in Late Modernit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00 (29): 25—38.
- [18] Crumpp T. The Phenomenon of Money. London: Routledge 1981.
- [19] Crumpp T. 1978. Money and number: the Trojan horse of language. Man (n.s.) 13. 4. PP. 503—518.
- [20] Weatherford. The History of Money. London: Random House Inc 1997.
- [21] Kwon H. 2007. The dollarization of Vietnamese ghost money. JRAI 13. 1. 73—90.
- [22] Appbaury K. 2003. The Marketing Era: from professional practice to global provisioning. New York: Routledge.
- [23] Douglas M. and B. Isherwood 1979. The World of Goods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consumption. London: Routledge.
- [24] Appadurai A. (ed) 1986.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5] Cynthia Werner, 1999. The Dynamics of Feasting and Gift Exchange in Rural Kazakhstan. In Contemporary Kazakh Soci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Ingvar Svanberg. London: Curzon Press. PP. 47—72. Lemon 1998. Shifting Metropes: Social Order and Chaos on the Moscow Metro. in Review of Anthropology of East Europe and Russia (fall).
- [26] 陈庆德. 经济人类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37.
- [27] Gudeman Stephen 1986. Economics as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Gudeman Stephen and Alberto Rivera 1990. Conversations in Colomb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udeman 2001. The Anthropology of Economy: community, market and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收稿日期: 2009—10—27 责任编辑: 李克建